

简论桐城派学者李诚的学术精神*

王达敏

摘 要：安徽贵池学者李诚（1906—1977）是桐城派名家。他平生视学问为生命，以读书、著述和教书为职志。他继轨传统，融化新知，力图以其所学为国效命。在治学中，他持守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信念。在教学中，他兼容并包，在传授桐城家法之外，引入被桐城长辈视为非正统的选学思路。李诚生活于一个动荡年代，虽胸怀壮志，却因时运不济，在历经磨难后，最终以布衣之身怀璧终老。而今，斯人已去，唯其终生所持守与向往的精神独立、思想自由如炬，光被世间。

关键词：学术精神 为学问而生 为国效命 独立自由 兼容并包

安徽贵池学者李诚（1906—1977）是桐城派名家。他于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负笈秋浦，入周学熙创办的宏毅学舍，从桐城派大师姚永朴问学。十九年（1930）由姚永朴举荐，至桐城派大师马其昶家执教，前后三年，所教弟子后来卓有成就者有马茂元、舒芜等。二十六年（1937）至郎溪县吴孟复家执教。三十七年（1948）任贵池昭明国学专科学校讲师。三十八年（1949）任江南文化学院讲师。1953年任安徽省文史馆干事，直至1971年退休。

李诚平生视学问为生命，以读书、著述和教书为职志。他继轨传统，融化新知，力图以其所学为国效命。在治学中，他持守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信念。在教学中，他兼容并包，在传授桐城家法之外，

* 说明：此文所用多数原始资料由李诚先生哲嗣李皋兰先生赐予，谨致谢忱！

引入被桐城老辈视为非正统的选学思路。李诚生活于一个动荡年代，虽胸怀壮志，却时运不济，在历经磨难后，最终以布衣之身怀璧终老。直至化烟化灰时刻，他呕心沥血写下的著作仍未露一线问世曙光。^①作别尘世之际，他屡吟杜甫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之句，感慨遥深。

一、为学问而生

李诚在宏毅学舍读书两年，受姚永朴、疏达等先生启谕，得桐城经史之学和诗古文义法之传，由此踏上研治古典文史之路。此后数十年间，学问就成为他生活的核心。无论在抗日战争期间，还是在“文革”中，他都竭力寻隙读书、写作。在漫长岁月里，他常常为能潜心学问而喜，也为无法埋头书册而悲。其弟子曾说：“李先生做人的目标似乎就是为了做学问”；“他似乎是把读书、做学问看成人生最大的乐趣”。^②

1938年九月，李诚家乡的城府在烽烟中化为废墟。在横飞的劫火中，他伏处深山，怀着悲愤，撰成《贵池历代兵事志》一卷。在介绍此文写作背景时，他说：“民国戊寅，兵戈又起，血满玄黄，吾邑城府为墟。而诚家在万山中，望劫火之横飞，睹灾黎之离散，慨然孤啸曰：此江上要冲，邑之所不能免也，观于古可知矣。因次往代兵事为一篇。”^③

1951年夏秋间，李诚参加池州区专署所办失业知识分子培训班。在结业时，他志愿去图书馆或学校，以便继续其酷爱的学术事业。但事与愿违，他被派到黄山管理处当办事员。不能从事学术工作，使他感到无比痛苦。他说：“这给我有生以来所未有的精神打击。流流眼

^① 经过多方努力，《李诚全集》（上、下）终于在2019年5月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^② 李克强：《追忆李诚先生》，《安徽日报》，1997年5月15日第7版。

^③ 李诚：《贵池历代兵事志后序》，稿本。

泪，‘一车离了徽州界，手拿信件上黄山’。”^①在黄山管理处，处长吕某把李诚当工友看待，视其为“会说话的工具”而随意使唤，读书、写作完全无法进行。他说：“我不料年将五十，竟受此奇耻大辱。我若不是素讲修养，真可以自杀，真可以发疯。”^②

1953年，李诚从黄山管理处调往安徽省文史馆，做图书室管理员。在采编、管理图书之外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。图书室由两间北房辟成，约有四五十平方米，四壁均是书橱，入门处摆有一张长条桌，他每天总是端坐在桌前，手不释卷，或执笔圈点，或颌首低吟，日复一日，几乎日日如此。^③

“文革”爆发后，李诚所在的图书室关闭。他的居所是大院角落里的一间偏房，面对庭院有一扇窗户，窗前摆着一张长条桌。办公室没有了，他就每天坐在居所窗下桌前用功。他读书是如此投入，以至于有时在煮菜过程中，也手握书卷。在他的时间表里，读书占了大部分，吃饭、睡觉也是为做学问服务。其弟子回忆说：“他总是专心致志地研读，从不见他为外界的风云变化而动容。”“他很少与人交往，虽然身居嘈杂的大院，除了有时谈点学问之外，很少说些别的。”^④

在困难情况下，李诚仍然与同道李则纲、殷涤非、冒效鲁、丁宁、何晓履、姚翁望和吴孟复悄悄地切磋学问。这七位学者，连同李诚，合为八老。八老皆有桐城派背景：李则纲、殷涤非和何晓履来自枞阳，早岁均受桐城派影响；冒效鲁之父冒广生曾向吴汝纶问学，他自己曾师从王树枏、袁思亮；姚翁望为姚永概哲嗣；丁宁早年师事桐城派名家程善之；吴孟复则为李诚、姚永朴、唐文治和袁思亮的弟子。八老各有所成：李则纲和李诚以史学名，殷涤非以考古学名，冒效鲁、何晓履、姚翁望以诗名，丁宁以词名，吴孟复则以研究古典文学名。在

① 李诚：《1953年十月撰自传》，稿本。

② 李诚：《1953年十月撰自传》、《李诚的自我检查及小组意见》，稿本。

③ 李克强：《追忆李诚先生》，《安徽日报》，1997年5月15日第7版。

④ 同上。

诸老中，李诚与丁宁尤称莫逆，平日里二人以师兄妹相称。李诚敬仰丁氏古典学养精深、雅人深致和有胆有识，常去探望。二人意气相投，心有灵犀，每相见必从容谈词论文，畅诉衷曲，以生命温暖着生命。^①

1949年后，李诚一有可能，就手不停挥，取得丰硕成果。他在1950年秋，于失业中撰成《两晋军事地理概论》。1954年岁杪，撰成《中国历代军事地理概论序言》。1955年，撰成《与黄秉维同志书》。1957年10月，撰成《三国战争志》。1959年3月10日，在《安徽日报》发表《“合肥”名称的由来》；6月10日，在该报发表《管子庄子是安徽人吗》；9月1日，在《安徽史学通讯》第三期发表《安徽省各县市名称考释》；此年撰成《阳城考》。1961年，撰成《关于研究历史地理的几点意见》。1963年，撰成《中国历代自然灾害总表》。1971年，撰成《上中枢书》。等等。1971年底至1977年谢世前夕，他在日薄崦嵫中，深锁书斋，持短笔，照孤灯，沙汰、补正旧作，构思、撰述新篇，最终纂成《李诚全集》数十种，煌煌百余万言。这些由心血铸成的文字，有才、有学、有识，也浸润着其悲悯、潇旷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苦恋。

二、按捺不住的关怀

桐城派的思想基础是儒家道统，其核心是孔孟程朱理学。桐城派诸家与其他信奉孔孟程朱理学的精英一样，有着牢不可破的内圣外王情结。他们既有志于道，追求高深的学问和高洁的情操，更有志于用，希冀在经世济民中实现人生价值。李诚主要经由桐城派接受了儒家内圣外王传统，一生务为有用之学。数十年间，不管地位多么卑微，际遇多么不幸，李诚的家国之念从来不曾摇动。

李诚早岁自我期许甚高，追求建功立业，时常心系民瘼。上小学

^① 李皋兰：《口述》。李澧兰：《2015年一月十四日口述》。

时，他羡慕为赵宋江山统一立下功勋的同邑名宦樊若水。樊氏在南唐怀才不遇，隐测采石矶处长江宽度，向宋太祖赵匡胤进献造浮桥渡江作战之策，直接导致南唐灭亡，入宋后颇受重用。李诚曾有“乐道浮梁口角涎，一溪委黛识吾颠”^①之句，借樊氏之事抒写怀抱。1928年，李诚因肺疾在家将养。当时匪患严重，山民不得安生。为保一方安宁，他奋不顾身，毅然参与领导地方团防，并因此而与青洪帮分子陈齐家等结下仇怨。^②

李诚在中国军事地理研究方面造诣颇深。他献身这项事业，则是因“七七事变”而起。他说：“抗战发生，有感于日人对中国军事地理的精熟，因而也来着手研究。”^③

抗战期间，李诚转徙于皖南多家中学任教。他身在讲堂，却心系国运。1939年6月6日，日军在晋南中条山发起大规模进攻，国军将领率部与敌寇血战，粉碎了其西犯企图。李诚闻捷，欣然命笔，撰写《山西抗战之我见》一篇，歌颂为国而战的将士，表达了对抗战必胜、国家现代化目标必能实现的信心。^④

1949年后，李诚接受学术为国家服务的观念。1961年3月16日，著名地理学家黄盛璋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历史地理学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》，以为：“今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，首先要以服务国民经济建设作为重点。就当前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论，则要以为农业服务为主要努力方向。”^⑤李诚读毕此文，撰成《关于研究历史地理的几点意见》，与黄氏桴鼓相应。他指出：“一切科学都有共同的任务，即为国家经济建设、文化建设或国防建设服务。研究历史地理这一部门，虽然它表现的形式、通过的途径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，但在负起这种

① 李诚：《贵池诗话·四十八·乐道浮梁口角涎》，稿本。

② 李诚：《1955年自撰行年表》、《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李诚的自我检查》。李辛白：《1956年三月十八日致李英》。李英：《1956年三月二十八日向审干办公室的报告》，稿本。

③ 李诚：《李诚自传》，稿本。

④ 李诚：《山西抗战之我见》，稿本。

⑤ 黄盛璋：《历史地理学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》，《人民日报》，1961年3月16日第7版。

任务中，一样可以尽一分力量。”他认为，求实用必须与求真相结合，才能使历史地理学更好地为现实服务。^①

李诚治学的目的，是为国家效力。1950年他除了支持妻子陈爱女向国家捐钱、捐结婚金戒外，又根据自己研究军事地理的心得和对国际大势的了解，上书毛泽东建言。^②1970年冬，国内备战正酣。他为合肥市人民武装部撰写《合肥军事概论》，以备参考。^③1971年秋，在美国宣布从越南撤兵、中美联合发表基辛格访华公报的背景下，他撰《上中枢书》一首，以辽阔的胸襟，从军事地理角度，对印度支那战争、泰国革命和如何控制马六甲海峡等问题独抒己见。因信息所限，其议论未必得当，但其对国家的赤诚，却弥漫在字里行间。^④1974年，他日走安徽省图书馆，借阅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和明清诸志书，择其关涉经济文化者手自录之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等书重军事载籍、历史沿革，而经济文化部分阙如，他有志补缺，以裨世用。^⑤

三、独立与自由

1929年，陈寅恪在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中把中国知识者的现代性追求概括为：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”^⑥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史上，能坚持这一现代性追求的，除了陈寅恪、顾准等外，还有位居学坛边缘的李诚。

桐城派所尊奉的程朱理学尽管提倡得君行道，但也有“从道不从

① 李诚：《关于研究历史地理的几点意见》，稿本。

② 李诚：《李诚自传》，稿本。

③ 李诚：《合肥军事概论》，稿本。

④ 李诚：《上中枢书》，稿本。

⑤ 吴孟复：《敬夫李先生传》，稿本。

⑥ 陈寅恪：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，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北京：读书·生活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246页。

君”的一面。这“从道不从君”的观念中，就包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素质。桐城先贤戴名世在异族统治下孜孜于追踪南明之迹，终罹杀身之祸；方苞在金殿屡持己见，终受折辱而被谴；姚鼐与乾隆帝和庙堂诸公的学术宗尚异趣，被迫自放，等等。这一切就是程朱理学“从道不从君”观念的具体呈现。李诚坚持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，实与其善撷桐城之学的精华而自润有关。

李诚是在“五四”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。他说：“当我做学生的时候，接受过‘五四运动’以后新思想的洗礼。”^①“中国有两个百家争鸣时代：一是晚周先秦诸子；二是五四以后的十年左右。”^②他认为，“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古国，而五四以来又孕育不少新知，其不能为套语所蒙蔽者势也。读书人阅世立论，最不要为一时现象蒙蔽，尤不可以几个简单名词（如新旧、落后、前进、封建、迷信等）打倒一切。阅世高谈，自辟户牖，才算是读书人”^③。由于受“五四”新思潮洗礼，李诚崇尚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。他说：就近代以来形成的知识者群体而言，“五四时代陶冶出来的，能发挥自由思想”^④。这些能发挥自由思想的学者，他表示钦敬的有胡适、梁漱溟和张东荪、张君勱。他说：“现在人批评胡适，其实独立自主地发议论，这一点正是胡适的长处。”^⑤他赞成张东荪、张君勱主张的“学术研究要有自由空气”^⑥。他佩服梁漱溟敢于“独立不倚”、“说老实话”^⑦。李诚在思想上与胡适、梁漱溟和张东荪、张君勱颇有渊源。胡适的书，他读的遍数很多。1930年之后，梁漱溟主办《村治月刊》，他订阅该杂志两年，并遍览梁氏著述。1931年10月，张东荪和张君勱一起在北平创办《再

① 李诚：《我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》，稿本。

② 李诚：《向党交心》，油印本。

③ 李诚：《给李英》其一，稿本。

④ 李诚：《向党交心》，油印本。

⑤ 李诚：《给李英》其一，稿本。

⑥ 李诚：《向党交心》，油印本。

⑦ 李诚：《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》，稿本。

生》杂志，他订阅该杂志一年。因此，不管胡适、梁漱溟和张东荪处于何种境地，他都一如既往地对他们表示尊重。

李诚因坚持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，与谊兼师友的历史学家李则纲产生分歧。李诚早年结识李则纲，屡蒙提携，对其人品、学问均极敬重，终生以李老夫子称之。李则纲是安徽省文化界重镇，1949年后，历任安徽大学教授、皖南文物馆馆长、安徽省博物馆馆长、安徽省文化局副局长、安徽省图书馆副馆长、安徽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。李则纲的问题在于，他常常根据环境变化而改变观点。凡是出现一种新提法，他就会依之对自己的书稿《安徽历史述要》修改一次。而在特定年代，新提法层出不穷，他的修改工作因而也就没有已时。李诚对此颇感惋惜，尝善意讽喻曰：“李老夫子，《安徽历史述要》不要再改了，再改就不是安徽历史了，也不是你的东西了。”李则纲不反驳，也不纳之。李诚就此一再对人言：“著述贵有独立个性，贵有创获。若作者一味看风使舵，弄出来的作品四不像，还有什么意思？学者要眼界高远，要往后看数十年甚至更长远时段，不要顾忌一时之褒贬。”^①

李诚与儿子李英长期不谐。父子矛盾的实质在于：父亲坚持独立与自由，反对儿子跟着说、说套语。儿子则嫌父亲落后。李诚责备儿子：“数年以来，‘跟着说’已成为你的本性和习惯。我的话你必不以为然。你的所然者只是些‘套语’而已。”^②又说：“两岁的小孩子，保姆教他说‘嘴’说‘鼻’，他也跟着说，而且会说，这就是能。一个成年人如果也跟着人家，指着嘴说，这是嘴；指着鼻说，这是鼻，那不是‘能’，而是白痴了。……我要自己的头脑——自由思想。我不愿意我的嘴长在人家的鼻子下。”^③

① 李有光：《李则刚年表》，李修松主编：《李则刚遗著选编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705—722页。李皋兰：《2015年一月三日口述》、《2016年七月十九日口述》。

② 李诚：《给李英》其二，稿本。

③ 李诚：《给李英》其五，稿本。

四、兼容并包

李诚从事教育工作数十载。在传道授业中，他兼容并包，于桐城家法之外，引入被桐城诸老视为非正统的选学思路，开拓了弟子们的视野。

李诚学出桐城，在教学中最重桐城家法。首先，他教导弟子研读姚鼐纂《古文辞类纂》和曾国藩纂《经史百家杂钞》。^①这两部书是桐城派的圣经，是该派的文统和道统所在，也是桐城后学取之不尽的源泉。其次，他教弟子诵读时，一本从刘大櫆、姚鼐到曾国藩相传的声调，于抑扬抗坠中，体味文境和情韵。^②第三，他教弟子研习经书时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之注用姚永朴、姚永概在北京大学时所编讲义，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之解则用马其昶所注之书；^③第四，他教弟子严辨雅俗。姚鼐曾说：“大抵作诗古文，皆急须先辨雅俗。俗气不除尽，则无由入门，况求妙绝之境乎？”^④李诚绍继姚鼐衣钵，以为：“初学者宁可少读书，或者等书读，也不能读类似三家村中的书。这是因为沾了村夫俗子之气后，再脱胎换骨便难了，所谓璞玉可以雕琢。”其弟子说：“记得有一个春天的傍晚，我在院中借助微凉的晚风读《古文观止》，在那个对古代文化进行‘革命’的年代，能找到这样的书并非易事。但李先生发现后，却不以为然，他断然斥之为‘村书’，认为不值得读。……他一再说明，发乎其上，得乎其中；发乎其中，得乎其下。发乎其下，便什么也没有了。……对一些品味不够的书，他甚至反对过目，担心无意中收入记忆库，以致混淆黑白。”^⑤

除桐城家法之外，李诚在教学中亦重六朝骈文。桐城派自方苞、

① 李国强：《追忆李诚先生》，《安徽日报》，1997年5月15日第7版。

② 吴孟复：《敬夫李先生传》，稿本。

③ 舒芜：《“国学大师李诚”议》，复印件。

④ 姚鼐：《与陈硕士》，《惜抱先生尺牍》卷六。

⑤ 李国强：《追忆李诚先生》，《安徽日报》，1997年5月15日第7版。

姚鼐起，倡导文以载道，学继程朱，文承韩欧，认为六朝骈文乃衰世之音，与道远隔，因而极力排斥之。在桐城派外，这一观念在乾嘉时代受到以阮元为首的仪征派挑战，在清末民初受到刘师培、黄侃等学者狙击。在桐城派内，曾国藩等对这一观念有所调整，主张骈散兼采，而以散体为归；管同、马其昶、姚永概、姚永朴等则谨守桐城家法，以骈文为非正统。李诚随姚永朴等学唐宋文，但也受章太炎派学者影响，对魏晋文有所偏爱。他说：“予谓魏晋文意多于词，唐宋文词多于意。故予自二十以后，读魏晋文，则为之醞醞有余味焉。”^①又说：“骈、散好尚，随时代而变异，此如晋楚之迭霸耳，固无所谓正宗，亦无所谓偏统。”^②因此，他教弟子时，在方姚外另辟新境，将选学的经典《昭明文选》作为教材。他为弟子讲授的骈文名篇有《哀江南赋》、《玉台新咏序》、《与杨遵彦书》、《李陵答苏武书》、《滕王阁序》、《北山移文》、《吊古战场文》等。这些篇章辞采富丽，重个性抒发，最能澡雪少年灵台，因而受到弟子喜爱。^③

在李诚的弟子中，成就斐然者有马茂元、吴孟复和舒芜等。这三位弟子离开李诚后，转益多师，皆成学坛名流。三人在学术探索中渐生差别。马茂元、吴孟复绍继李诚和其他桐城学者看重桐城家法的一面，虽不排斥选学，终视桐城派为正宗，对桐城诸老怀着深沉的孺慕之情。舒芜则沿着李诚引入的非正统思路，对桐城派起了叛逆之心。他以为，桐城派坚持文以载道，攘斥异端，具有定于一尊的专制品格。他站在五四立场，坚持民主与科学，希望解放个性，也解放文学。^④舒芜晚年说：“李先生给我们选讲文章里面体现的非正统的思路，对我后

① 李诚：《读书随笔》，稿本。

② 李诚：《读书随笔》，稿本。

③ 李诚：《1955年自撰行年表》，稿本。吴孟复：《马茂元与桐城派》，复印件；《敬夫李先生传》，稿本。舒芜：《“国学大师李诚”议》，复印件。

④ 舒芜：《“桐城谬种”问题之回顾》，《读书》，1989年第11—12期；《吴孟复作〈唐宋八大家简述〉序》，《舒芜集》（二）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364—369页。

来的道路发生深刻的影响。”^①李诚及其弟子对桐城之学有坚守，也有扬弃。无论坚守或扬弃，都是一种深刻，也是一种襟怀。这深刻和襟怀，属于他们自己，也属于桐城派。桐城派的生命力不在别处，正在这或坚守，或扬弃之中。



① 舒芜：《“国学大师李诚”议》，复印件。